

· 二十世纪文献学 ·

白话俗语词研究的百年历程

徐时仪

白话俗语词包括方言词和口头语词。^①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用汉语写成的文献多至亿万，然而“五四”以前，作为书面语，文言文一直占着统治地位，只有在小说、戏曲等作品中才采用白话。文言文被认为是雅的，白话文被认为是俗的。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经学为根基和核心的，儒家思想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居于正统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精神生活和道德观念的基本准则，以十三经为代表的儒家著作也被奉为钦定的经典。在尊儒崇经风气的影响下，作为经学附庸的传统训诂学仅仅着眼于上古经传及诸子的材料，主要致力于研究解释儒家经典中的词语，历代的辞书对口语中大量白话俗语词也置之不顾，历代的白话俗语词一直被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因而对这些词汇的研究有所忽视，只有一些零散的研究著作。

郭在贻曾指出：“在整个汉语史的研究中，关于词汇史的研究是最薄弱的环节，而在词汇史的研究中，关于俗语词的研究又几乎等于零。”^②古代汉语辞书对先秦两汉的词语收录得较多，意义的诠释也较完备，而对魏晋以下的词语则相对收录诠释得较少。综观白话俗语词的研究历史，大致可以以二十世纪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即二十世纪以前附属于传统的语文学研究阶段；二十世纪以

后的草创和发展阶段。二十世纪以后白话俗语词研究渐由不自觉的附庸到自觉的投入，大略可分为三、四十年代西学东渐时的草创时期；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的发展时期；文化大革命时的萧条时期；七十年代的复苏时期和八十年代至今的初步繁荣时期。本文拟就二十世纪以来的白话俗语词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

一、西学东渐时的草创时期

清代以后白话俗语词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诠释白话俗语词的著作有罗振玉《俗说》、胡朴安《俗语典》、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李鉴堂《俗语考源》、王国维《俗说》等。

胡朴安《俗语典》(1922)收罗宏富，考释详赡。主要汇编曾见于文字记载的古今俗语共7200条，其中包括：一、一般词语和当时社会流行的特殊名词、称谓词；二、成语；三、谚语；四、文言俗语；五、口语俗语。其编写体例是只注明俗语的出处而不加解释，“必见于古人文字者始搜集之，以明俗语之有本”，“有一俗语，必举二书”，注重考源。作者自序说编撰此书的目的在于一是前人虽多有著录，但未能蔚为大观，且编纂无法；二是近时语体盛行，这样的书“为现时之需”，“于言语之学，大有裨益”。

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1927)，全书仿清人瞿灏《通俗编》，立天地、天文、地理、水火、宫室、朝署、家族、祸福、交际等40余类，根据词语部分的语素义进行词语分类。作者自序说到通俗常言，代有引用，而“元人词曲小说则流传俗语孱入尤多”，“今天下常言者元人语十占六七”，故此书特别注重元人词曲小说中俗语的搜集。

李鉴堂《俗语考源》(1937)，释俗语意义往往兼及原有意义和今义，说明出典。

“五四”前后，西方学术思想传入我国，传统训诂学也注意借鉴外国的理论方法，发展为以语言为研究对象，探讨语言变化规

律，进入了语源学新天地。1928年，黎锦熙发表《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1929年发表《中国近代语研究法》，1934年又发表《近代国语文学之训诂研究示例》，指出近代汉语文学作品“只因向来视为文人余事，音释缺如；语词、句法，今多不解。近来青年读物，既多取材于此，训诂不明，何从欣赏？一查字书，则绝不提及；欲加注释，则参证无从。故宜各就专书，分别归纳，随事旁证，得其确诂，以阐妙文，以惠学子。”1928年他在北师大国文系开设“近代语研究”选修课，又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设立“戏曲股”，专门搜集金元明清的散曲、杂剧，写出了一批元曲词语论著。当时拟议编纂的这部《大辞典》主旨之一是“探讨古今用语之变迁”，“所有古今单字及连绵两字以上之复合词或成语，概行采集，务求得其本始，明其流变”，“每一个词（包括单字词）都要顺着它的时代（就可能的范围说，是从公元前十六世纪的甲骨文字到现代的国语和方言，绵亘约三千六百年），叙明它的‘形’‘音’‘义’变迁的历史”。《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计划书》中明确提出了“国语常用词”的概念。在材料收集方面，此书很注重“唐宋以来（约在第八九世纪以后）用近代语写成之文学作品，如诗、词、曲、白话小说、歌谣等；又佛家及儒门之语录、书札，以至现代之语体书报等”（黎锦熙 1935）。由于时局变迁，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虽然未能如期完成，但也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据黎锦熙 1934 年所作《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第六次报告书》的记载，这些成果有黎锦熙《宋元语词广证》十卷、《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一篇、《〈近思录〉释词》一卷（附《索引》一卷）、《“爸爸”考》一篇、何容《说现行语中之“爸爸”与“父亲”》一篇、刘复《“打”雅》一卷、《释“吃”》一篇、郑侯《“打”字别用类例》一篇等等。

黎锦熙还曾设想要编一本《新尔雅及其疏证》，以“近代语特有之词及普通词之特别用法”为研究内容，“上溯语原，旁征典籍，下稽方俗，逐词推证，以类相从。”“训诂拟《尔雅》而不袭其类；

声训仿《释名》而必究其根；说解效《说文》而必繁其辞；调查准《方言》而必注其音。复词成语，悉依语根而统于单字；事类文字当谋便检而附以索引。”他在1933年出版的《比较文法》一书序言中说：“普通今语和特别白话（即古白话与今方言）的比较，这本来也是中学讲读教材中特别需要的，只因学者不研究这一层，只有周秦汉晋‘经’、‘传’释词，没有唐宋明清‘诗词’、‘语录’、‘戏曲’、‘小说’释词，所以目前还无办法，只好暂定为大学‘近代语研究’的工作了。”他认为应当将高校中文系本科或研究生作为近代汉语研究的基地，有分工有合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专题或专书研究，“一书研究完毕，可定名为某书语言研究（或某书考证、某书释词、某书文法等，随时酌定）”，“此项出版物至十种以上时，可依某时代或某种文体合并改编为词书式之刊物。”待“各组要籍研究完毕时，可合并改编成为一部近代汉语大辞书”。他撰写的论文后来收录在《汉语释词论文集》中，未出版的《文法辞典》和《宋元语词广证》汇集在1937年出版的《国语辞典》里。

吴梅和任中敏等一些研究戏曲的学者在二十年代也留意于元曲方言俗语，在词语考证和解释方面作出过贡献。王季思则不仅以《西厢记》注本名重当世，而且写了《诈妮子调风月》写定本说明，撰有《翠叶庵读曲琐记》、《元剧谐音双关语》等一批文章，考释了元曲中大量的方言俗语。

吕叔湘早年也对《三国志》中的词语作有解释，他所写的一些语法论文实际上已开白话俗语词研究之先河，其《笔记文选读》对一些俗语词的注释极为精确，《近代汉语指代词》则第一次对汉魏以来的指代词作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讨论了大多数指代词的来源、用法和发展演变，既注重描写，也注意训释，融词汇和语法于一炉。他每当考求一个词语的意思时，总是到跟它同时期的文献中去找答案，而不是以今律古，牵强附会，同时具

有语法观点，不是孤立地以字论义，而是从全句的语义、语气来判断一个词语在句中的作用。如《语法札记》（1944~1947）中《莫须有》一文考《宋史·岳飞传》中“莫须有”以唐宋文献为证，说明“莫”字为测度疑问之词，“莫须”相当于“恐怕”、“别是”，“莫须有”即恐怕有、大概有之义。《将无同》一文引共时资料证明“无”字不应以实理解，“将无”为一词，跟“将非”、“将不”等一样，除表测度外，还可用于委婉的提议。“将无同”即“恐怕没有什么两样吧”的意思。

1947年，王力在《新训诂学》中提出要“把语言历史的每一个时代看作有同等的价值”，建立“新训诂学”（即语义学 Semantics），把语言史视为文化史的一部分，语义史又是语言史的一部分，使其成为“纯粹观察、比较和解释的一种学问”。

这一时期研究白话俗语词的论文有何仲英《〈水浒传〉释词》（1921），王菩生《读何仲英先生〈水浒传〉释词》和《再读何仲英先生〈水浒传〉释词》（1921），汪馥泉《水浒词典草稿》（1940），余嘉锡《〈水浒传〉之俗语》（1946），吴世昌《敦煌卷季布骂阵词文考释》（1939），顾随《元曲中方言考》（1936），纪伯庸《元曲助字杂考》（1948），蔡正华《元曲方言考》，朱东润《说衙内》（1937），吴晓铃《说罢罢》、《说罢罢补》（1941）、《葫芦提》、《说六阳会首》（1948），严敦易《颠不刺的》（1947），昭琛《晋宋习语》（1948），刘溶池《“颠不刺”悬释》、《元曲方言试解》、《元曲释词》、《元代文学俗语考释》（1948），王季思《元曲中谐音双关语》（1948），孙楷第《释上下》（1948）等。

1948年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由商务印书馆初版，1956年重印，增加补遗部分。这是解释金元戏曲方言俗语的第一部专著。从语言学的角度，“以曲释曲”。作者的目的是诠释金元戏曲中的费解之词和表面明白其实费解之词，特别注意搜集训释元曲中的方言口语词。罗常培、赵景深所写序言誉为“斩荆批棘，导

夫先路”之作。当然，作为解释元杂剧词语的第一部工具书，此书收入的词汇有限，举例也不够广，尚不能很好地解决阅读元曲中的疑难。潘庚有《读〈金元戏曲方言〉考质疑》（1960）就其中一些词语提出了质疑，如“撒沁”是“说村话，耍调皮”，不是“装腔做势，不睬，骄傲”等。

这一时期新编的一些词典也收释了不少白话俗语词。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和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都收了一些小说诗词曲中的常用语词。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国语辞典》，收词语10多万条，以国语词语为主，也收了不少宋元白话作品中的词语。

二、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的发展时期

解放初期，语言文字工作受到政府的重视。在社会变革的影响和国家语文政策的推动下，白话俗语词研究有了新的发展。王力的《汉语史稿》（下）（1958）是建国后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词汇史专著。此书对汉语整个词汇发展的历史作了初步的勾勒，对汉魏以来常用词语的演变和佛教借词等的研究也有所涉猎，指出当某个词义消失时，这个概念并没有跟着消失，它找一个“能表者”来表示它。有时候，旧词只在文言语中使用，在日常口语中让位于新词，也就是概念变了名称。如“走路”的概念，古人用“行”表示，大约在明代才用“走”表示。概念改变名称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如“走路”的概念由“行”改用“走”来表示，表示“跑”的概念就由“走”改用“跑”来表示了。

这一时期一些集中研究某一阶段的词汇、某种某类作品的词汇、某一方面词汇的论著和论文相继问世，主要有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等。

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撰成于1945年，1953年由中华书

局出版,共6卷,汇集解释唐宋金元明人诗词曲中的特殊词语600多条。这些词语或字型生涩而义晦,或字型普通而义别,“其性质泰半通俗,非雅诂旧义所能赅”,此书专把诗词曲的语言材料作为研究的对象,无疑是在打破贵古贱今观念后的勇敢的拓荒,开辟了白话俗语词(主要是口语词)研究的新领域,开拓了从中世到近世中国语言史研究的一个新生面。^③

朱居易《元剧俗语方言例释》(1956),该书共收词一千多条,其中见于徐著和张著的约二百多条。其体例称“纯录短语,不取单词”。书中所收条目以元杂剧为主,元人散曲及明初剧作仅作旁证。释词尽量以曲证曲,间及话本小说以资旁证。举例必录全句,并注有曲牌与宾白,出处著录较详,尤其是收集诠释俗语丰富,注意说明词义的理据,不失为元曲研究方面的一部专门工具书,但是书中也有一些词语的解释不够精审。蔡美彪《元人杂剧中的若干译语》(1957)不仅指出其译语注释方面的错误,而且还指出其对汉语俗语的错误注解。张清常《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1978)也批评了其释词中一些望文生训之处。

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专门解释敦煌石室所载唐五代变文中的口语词语,中华书局1959年初版,1960年再版。1981年和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第四版和第五版,1997年又据蒋礼鸿生前在第四次增订本的自存本上所作的亲笔笺补出版了增补定本。此书是中国当代敦煌语言研究的重大成果,首次对敦煌变文中的口语词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开敦煌文献语词研究的先河,学术界誉之为“研究中国通俗文学的指路明灯”,“步入敦煌宝库的必读之书”。^④

陆澹安《小说词语汇释》(1964)收录解释古代语体小说中的词语约8000条,每条各举一、二例,目的在于帮助阅读,后附小说成语汇纂2000多条。此文继诗词曲变文后,开拓了小说体裁中白话词语的考释。白维国《〈小说词语汇释〉误释举例》(1981)、隋文昭

《〈小说词语汇释〉训释匡议》(1988)等就其中一些词语做有补正。

这一时期有关白话俗语词的论文的有徐震堉《〈世说新语〉里的晋宋口语释义》(1957),冯沅君《季布骂阵词文补校》(1951),瑞典高歌蒂《朱子全书中所见的宋代口语》(1958),张煦侯《〈唐语林〉中的口语成分》(1959),徐复《敦煌变文词语研究》(1961),胡竹安《敦煌变文中的双音连词》(1961),郑奠《汉语词汇史随笔》(1959~1961),许政扬《宋元小说戏曲语释(一)》(1964)等30余篇。俞平伯《“不当家花拉的”》(1959)讨论《红楼梦》中“不当家花拉的”一词,认为相当于南方话的“罪过”。《中国语文》1959年第9期予以转载,并发表吴晓铃《也谈“不当家花拉的”》一文,接着在第12期又登了有关这个方言词的六篇短稿。其编者按《关于“不当家花拉的”》指出讨论“不当家花拉的”词义的“用意不单纯在于解释这个词,而是想借此说明一下汉语词义的研究必须重视活语言材料”,体现了对探讨白话俗语词词义演变的重视。

三、文化大革命时的萧条时期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冲击了一切领域,白话俗语词研究也被迫中断。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极左思潮占据了统治地位,过去数十年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被一概否定。

这一时期台湾省黄丽贞撰有《金元北曲语汇之研究》(1968)。该书着重收录诠释金元戏曲中的方言俗语,诠释了429条词语,探讨了状物拟声词、外来语、歇后语、语助词和衬字等。除了台湾省的一些论著外,这一时期白话俗语词研究领域中基本上是一派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荒凉景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乙编(1950~1980)统计,仅有配合当时政治需要的几篇有关《水浒传》和《红楼梦》词语解释的文章而已。^⑤

然而中华民族毕竟不乏忍辱负重的真正脊梁骨,即使在这种环境里,仍然有一些学者在逆境中顽强拼搏,在白话俗语词词汇研

究领域中默默耕耘着，故“文化大革命”一结束，蒋礼鸿、刘坚、王璞、顾学颉、郭在贻等的研究成果即破土而出，陆续发表出来，体现了多年锲而不舍的厚积功力。

四、七十年代的复苏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白话俗语词研究也和其它学科的研究一样重又焕发出勃勃生机。

1977年3月中华书局为满足读者在文化大劫之后日益迫切的求知欲，重印发行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其重印说明云：“《诗词曲语辞汇释》，汇集了唐宋金元明以来流行于诗词剧曲中的特殊语辞，详引例证，解释辞义与用法，兼谈其流变与演化，对于研究古典文学、语言学都有一定参考价值。此书为作者解放前的旧著，其中有些例句，内容不好，格调不高。为满足有关专业工作者的需要，现据一九五五年第三版，重印发行。”既衷心地高度评价了此书为专业工作者所重的价值，又带有当时劫后余惊而自求保护的惯用套语，颇能显示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时代特点。

这一时期的论文主要有蒋礼鸿《敦煌资料（第一辑）词释》（1978）、王璞《诗词曲语辞举例》（1978）、顾学颉《元剧（曲）辞语诠释举例》（1978）、徐复《读〈文选〉札记》（1979）、徐震堃《〈世说新语〉词语简释》（1979）、许政扬《宋元小说戏曲语释（二）》（1979）、龙潜庵《宋元语词札记》（1979）、殷孟伦《杜诗名篇中几个词语的训释问题》（1979）、张永言《李贺诗词义杂记》（1979）、刁汝钧《〈敦煌变文〉研究管见》（1979）、杨乃济《红边杂俎-红楼梦建筑词语释五则》（1979）等，大多为个别词语的解释和辨析，有关白话俗词语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

五、八十年代至今的初步繁荣时期

70年代末80年代初，白话俗语词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初步繁荣时期。就范围来说,上至汉魏,下至明清,诗文、笔记、小说、戏曲、佛典、语录等均在研究之列。就内容来说,已不仅仅局限于词义的考释,有关词义的构成、词义的系统、词义的诠释、词义的演变、词义的色彩、词义与语音、词义与文字等都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呈现出一种理论探讨的趋势。就材料来说,有的论文大量使用了佛经中的语言材料,从而在考释词义源流方面有了突破。就方法来说,有的论文广泛运用了方言佐证法,从现代汉语的某些方言中去追踪白话俗语词的渊源关系,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以来,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学术界以更开阔的视野看世界,中外学术思想的交流对白话俗语词的研究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8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的一个学术反思的年代,人们对白话俗语词研究的现状有着普遍的不满。颜洽茂《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反思和创新》(1986)以翔实材料和深刻的分析,指出30年来的词汇研究在理论上的探讨十分薄弱。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和启示,对问题的分析深入不下去。汉语词汇的研究受传统模式的束缚,方法上还只是一种机械式的语言单一发展观,而没有从语言的历时发展与共时变化相结合的角度来看问题。此文谈的虽是古代词汇的研究,但对整个词汇学的研究都有普遍意义。人们真正认识到词汇研究的现状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加强白话俗语词的研究也成为人们的共识。

这一时期白话俗语词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取得了较为长足的进展,渐由零星的词语考释趋于从理论上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白话俗语词研究的文章常常见诸报刊,一些专著和专书断代词语词典也相继出版,下文分汉译佛经、敦煌吐鲁番文献、禅儒语录、诗词曲、小说、笔记杂著等就此时期有关白话词语研究的论著和论文略作介绍。

汉译佛典是白话词语研究的重要语料。这些佛经的成书年代

大致在东汉至唐五代之间,较为系统地保存了从东汉到唐代的口语材料。这一时期考释佛经词语的主要论著有胡竹安《〈法显传〉词语札记》(1986),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1992)、《汉译佛典语义中的原典影响初探》(1993),李维琦《佛经释词》(1993)、《佛经续释词》(1999),方一新《汉魏六朝翻译佛经释词》(1992),俞理明《佛经文献语言》(1993),颜洽茂《佛教语言阐释》,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1994),日本学者辛岛静志《汉译佛典的语言研究》(1997~1998)等。

敦煌吐鲁番文献词语的研究有祝敏彻和尚春生《敦煌变文中的几个行为动词》(1984),许仰民《敦煌变文假借字音义关系研究》(1984),廖名春《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词管窥》(1990),张涌泉《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1990),黄征《敦煌语文丛说》(1997)、《敦煌俗语词辑释》(1997),董志翘《敦煌文书词语考释》(1998),日本高田时雄《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的语言及敦煌写本的性质》,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1996),项楚《敦煌变文语词札记》(1981)、《敦煌变文校勘商榷》(1982)、《敦煌变文语辞札记》(1982)、《变文字义零拾》(1984)、《敦煌变文词语校释商兑》(1985)、《敦煌变文字义续拾》(1988),刘坚《校勘在俗语词研究中的应用》(1981),陈治文《“浑圪自扑”校释》(1981)、《敦煌变文词语校释拾遗》(1982),周光庆《敦煌变文释词》(1981),郭在贻《敦煌变文校勘拾遗》(1983),梅祖麟《敦煌变文里的“熠没”和“𠵿(举)”字》(1983),江蓝生《敦煌写本燕子赋二种校注》、《“望空便额”别解》(1983),袁宾《敦煌变文校勘零拾》(1984)、《变文词语考释录》(1988)、《敦煌变文虚词拾零》(1985)、《敦煌变文集词语拾零》(1985),蒋绍愚《敦煌变文集(上册)校补》(1988),祝敏彻《敦煌变文中的几个行为动词》(1984),刘凯鸣《敦煌变文校勘复议》(1985)、《敦煌变文字义校释零札》(1987),张金泉《变文词义释例初探》(1988),孙其芳《敦煌词中的方言释例》(1982),董希谦、马国强《敦煌变文词义商榷》

(1991),马国强《敦煌变文选注指误》(1993)、《敦煌变文双恩记校注商补》(1995),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1980),项楚《〈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1981)、《〈王梵志诗校辑〉匡补》(1985~1986)、《王梵志诗释词》(1986),蒋绍愚《〈王梵志诗校辑〉商榷》(1980),刘瑞明《王梵志诗注辨正》(1985)、《“望空”补正》(1986)《“生缘”试释》(1986),袁宾《〈王梵志诗校辑〉校释补正》(1985),信应举《〈王梵志诗校辑〉注商榷》(1987),黄征《敦煌文学儿郎伟辑录校注》(1988),钟兆华《释“趁急”》(1991)、《敦煌愿文散校》(1994),张美兰《敦煌变文词语拾零》(1992),黄灵庚《敦煌变文选注校释商兑》(1993),樊维纲《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商补》(1993),王继如《丑女缘起补说》(1993),蒋冀骋《敦煌释词》(1993),张涌泉《敦煌文书疑难词语辨释四则》(1996),张生汉《敦煌变文语词杂释》(1996),董志翘《敦煌文书词语考释》(1998),曾良《敦煌文献字义杂考》(1998)等。浙江大学敦煌研究所还拟在已有敦煌文献词语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编写一部《敦煌遗书词义通释》。

自80年代以来,禅宗语言也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禅僧往往使用通俗化的口语谈论禅的问题,他们的语录也基本上按照当时口语的形式记录下来。研究禅宗语言的论文有蒋绍愚《〈祖堂集〉词语试释》(1985),古贺英彦《禅语辞典》(1991),袁宾《禅宗著作词语汇释》(1990)、《禅语辞典》(1994),邢东风《禅宗语言问题在禅宗研究中的位置》(1996),董志翘《〈五灯会元〉词语考释》(1990),滕志贤《〈五灯会元〉词语例释》(1995),张美兰《禅宗语言概论》(1998)等。

1992年日本花园大学禅文化研究所成立“禅籍俗语言研究会”,创办《俗语言研究》杂志,从语言学角度考证禅录中出现的俗语、口语、俗谚等。禅籍俗语言研究会出版的《禅语辞书类聚》为六种解释禅录方语的汇编,所释词语多不为现有辞书收录。其中《禅林方语》收录方语322条,按佛祖、人名分类;日僧无著道忠(1653

~1744)撰《禅林方语》收录方语 674 条,按一言至五言字数顺序排列,释义并注明出典;《俗语解》收录 771 条语词,并注明出典解释词义,考证中广引《水浒传》等白话小说资料;服部天游《碧岩集方语解》专释《碧岩录》中俗语;无著道忠撰《禅林句集辨苗》,注释《禅林句集》所收 812 条语词的出典。无著道忠还著有《禅林象器笺》二十卷、《葛藤语笺》十卷等,通过原典来解释禅录中含有的疑难词语,对一些俗语的解釋则务求追溯到唐宋最典型的基础文献,从语言学考证的角度,对禅籍中的词语作了注释,显示了作者语言文字学上的深厚功力。

宋儒语录中的口语词特别丰富,许多词都是当时常用的俗语词。前苏联 G·卡尔格伦《宋代朱熹全书的口语研究》一文指出《御纂朱子全书》反映了朱熹时代真正的“官方”语言——知识阶层的口语。祝敏彻《〈朱子语类〉中成语与结构的关系》(1990)、《〈朱子语类〉句法研究》(1991),袁庆述《〈朱子语类〉方言俗语词考》(1990)、徐时仪《〈朱子语类〉词语考释》、《〈朱子语类〉词语诠释》(1991)、《〈朱子语类〉词语特点举隅》(1993)、《〈朱子语类〉词语札记》(1994)、《〈朱子语类〉口语词探义》(1996)和姚振武《〈朱子语类〉词语札记》(1992)、《〈朱子语类〉词语杂释》(1993)等以有关文献和史实为据,对《朱子语类》中的一些词语作了训释。

本时期诗词曲词语的研究也有较大进展。王锬《诗词曲语辞例释》(1980)和林昭德《诗词曲词语杂释》(1980)有意补充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成为《诗词曲语辞汇释》的继响。王锬等编的《诗词曲语辞集释》(1991)集腋成裘,收录自 1949 年至 1985 年散见于报刊的考释诗词曲语词的单篇论文数百篇。较为重要的论著和论文还有王云路《汉魏六朝诗歌语言论稿》,杜仲陵《略谈唐宋以后一些词的新义》(1980)、《唐诗词汇的时代特征》(1982),蒋礼鸿《杜诗释词》(1982),郭在贻《唐代白话诗释词》(1983)、《唐诗与俗语词》(1985)、《杜诗札记》(1985)、《杜诗异文释例》(1985)、《唐诗

中的反训词》(1985),马国强《唐诗语词札记》(1989),樊维纲《骆宾王诗文词语释》(1992),盐见邦彦《唐诗口语の研究》(1994)等。蒋绍愚《唐诗语言研究》(1990)则在诗学论述外,汇总了其在唐诗词语方面的训释成果。《白居易诗中与“口”有关的动词》(1993)和《白居易诗词语诠释》(1994)着重分析探讨了与“口”有关的四组动词从《世说新语》到白居易诗和《祖堂集》的发展演变情况,诠释了一些口语词语。

关于元曲词语研究的专著,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徐嘉瑞《金元戏曲方言考》为代表,以解释考订俗语方言为主;一类以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为代表,以解释虚词为主。

陆澹安《戏曲词语汇释》(1981)收入诸宫调院本剧中的词语约6000条,体例同《小说词语汇释》,两书是姐妹篇,词目相同的则互相参证,沟通了戏曲和小说中的方言俗语,成为此书的一大特点。刘凯鸣《〈戏曲词语汇释〉商榷》(1983)、李之亮《关于〈戏曲词语汇释〉的几点异议》(1983)、刘钧杰《〈戏曲词语汇释〉象声词诠释拾误》(1984)、董树人《〈戏曲词语汇释〉误释例证》(1986)等就其中有些词语作有商讨。

顾学颉、王学奇的《元曲释词》是迄今为止收集考释元曲词语篇幅中最大的一部专著,共四册。共收词语3000余条,连附目共5000余条。著者在具体释词中,本着纵横交错、原始要终的精神,旁收远绍,八方求索,力图能在古代文献资料 and 现代汉语中了解词语演变的过程,从而得出比较确切的解释。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以曲证曲”所难免的一些主观臆断。此书问世后,王迈《〈元曲释词〉商补》(1986)、汪儒琅《元曲释词六则》(1992)、徐时仪《〈元曲释词〉补》(1998)、刘瑞明《〈元曲释词〉第三册失误零拾》(1993)等文对书中“怕不待”、“扑俺”、“热乐”等词作有补正,并补释了此书未释的一些元曲词语。

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1991)第一次对元明戏曲中

的蒙古语作了专题研究，收释了元明戏曲中 114 个蒙古语，纠正了历来有关这些词语训释方面的失误。

此外，较为重要的论文还有孙玉溱《元杂剧中的蒙古语曲白》(1982)，吕叔湘《释“主腰”》(1983)，韩登庸《元杂剧中的少数民族语词》(1983)，李申《元曲词语今证》(1983)，王锬《元明剧曲语释》(一～四)(1982)、《俗语词研究与戏曲校勘》(1983)，赵金铭《元杂剧中的象声词》(1981)，王学奇《目前元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1982)、《论如何探索元曲的词义》(1984)、《关于元曲语词的溯源问题》(1987)和《元曲词语释例》(1992)，张永绵《元曲语言研究述略》(1984)，胡竹安《元明戏曲小说俗谚用例互证》(1986)，蓝立冀《元代直译公牒文某些用语在关汉卿作品里的反映》(1986)，顾学颉《元剧(曲)辞语诠释举例》(1978)，温公翊《元人杂剧语词释义》(1980)，星灿《元人杂剧语词释义》(1980)、《试释元明时之“亲”》(1981)，费秉勋《元曲语词训释商考》(1981)，赵日和《张协状元词语选释》(1982)，赵建功《元杂剧中的重叠词试探》(1982)，宋商《元曲词语札记》(1982)，李崇信《元曲词语解释》(1983)、《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商榷》(1987)，李申《元曲词语今证》(1983)，董绍克《元曲词语释义九则商补》(1990)，刘瑞明《元曲疑难词语释义》(1994)，王永炳《古典戏剧口语词释疑七则》(1997)等。

小说词语的训释主要有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1988)，段观宋《文言小说词语通释》(1993)，香坂顺一《水浒词汇研究(虚词部分)》(1987)等。《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考释了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的一些词语，引证浩博，释义精当。《文言小说词语通释》取历代文言小说，尤其是魏晋至宋元文言小说中某些现已不易理解而诸辞书又都不载的难词近 500 条，加以考释，考证严密。在描述词义的演变轨迹，即揭示词义的纵向联系的同时，也注意到揭示词义在演变中的相互关系，显示词义的横

向联系，从文言小说中的白话词语考释这个侧面展示了汉语词汇的大致面貌。《水浒词汇研究》参照《水浒传》的各种版本，将《水浒传》中600多个虚词分为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和助词五部分，逐个加以描写，作了简洁而深入的比较研究。

较为重要的论著论文还有郭在贻《〈游仙窟〉释词》(1981)、《〈太平广记〉里的俗语词考释》(1980)、《〈太平广记〉词语考释》(1980)、《〈太平广记选〉(上册)注释商榷》(1980)，王锬《〈太平广记〉语词释义》、《〈夷坚志〉语词选释》(1992)，段观宋《〈太平广记〉语词选释》(1989)，刘凯鸣《〈太平广记选〉(续)注释商榷》(1984)、《〈太平广记选〉注释商评》(1986)，胡竹安《〈水浒传〉中明代用语》(1983)，何阡陌《〈水浒传〉中的语言词句和言语词句》(1987)，周志锋《〈三言〉词语札记》(1992)，汪维辉《〈两拍〉词语札记》(1993)、《〈两拍〉释词》(1996)，董志翘《明代拟话本小说〈型世言〉语词例释》(1995)，徐之明《〈型世言〉俗语词考释》(1996)，梅季《〈西游记〉词语补释》(1990)，姚灵犀《瓶外卮言》(1940)所载《金瓶小札》；张远芬《〈金瓶梅〉词语选释》(1982)；朱星《〈金瓶梅〉的词汇语法札记》(1982)；白维国《〈金瓶梅词话〉特殊词语例释》(1981)、《金瓶梅和市井语》(1986)；李之亮《关于〈金瓶梅〉中数条词语的诠释》(1989)；傅憎享《〈金瓶梅〉词语误释归因》(1989)、《〈金瓶梅〉词语深层结构与文化内涵》(1993)；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1992)、《〈金瓶梅〉词语释义订补》(1992)，张惠英《〈金瓶梅〉中值得注意的语言现象》(1986)、《聊斋俚曲集中粗俗语举例》(1992)，卢甲文《〈金瓶梅词话〉难解词语选释》(1997)、《〈杨家将演义〉词语新释》和《〈杨家将演义〉词语重释》(1994)，章一鸣《〈金瓶梅词话〉和明代口语词汇语法研究》(1997)，张涌泉《〈金瓶梅〉词语考释》(1989)，蒋宗福《〈金瓶梅词话〉语词札记》(1997)，毛文

《〈红楼梦〉的俗语》(1996), 弥松颐《〈儿女英雄传〉词语汇释》(1981), 刘钧杰《从言语特征看蒲松龄跟〈醒世姻缘传〉的关系》(1988), 胡竹安《水浒词语辨释四则》(1989), 胡晓萍《〈红楼梦〉时间词研究札记》(1992), 太田辰夫《〈儿女英雄传〉的语言》(1991), 晁继周《曹雪芹与高鹗语言比较》(1993), 徐复岭《〈醒世姻缘传〉里的“打哩(打仔)”》(1993), 张鸿魁《〈金瓶梅〉“扛”字音义及字形讹变》(1994), 张生汉《〈歧路灯〉词语例释》(1995), 王宗祥《“没挞煞”索解》(1995), 徐之明《明清小说俗语辞杂考》(1996)、《“做……不着”新释商榷》(1999), 刘瑞明《“做……不着”新释》(1997), 杜爱英《〈醒世姻缘传〉语词拾零》(1997), 李申《〈醒世姻缘传〉词语考》(1995)等。

笔记、史书等词语的训释主要有王镆《唐宋笔记语辞汇释》(1990), 蔡镜浩《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 王云路和方一新《中古汉语词语例释》(1992)、《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1998), 刘百顺《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考释》, 吴金华《〈三国志〉校诂》、《〈世说新语〉考释》等。《唐宋笔记语辞汇释》诠释了唐宋两代笔记近300个词语。书后附有“笔记语辞备考录”, 为进一步研究这些词语提供了线索和资料。蒋宗许、刘云生《〈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商补》和蒋宗许《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备考录杂考》(1995)就王镆《唐宋笔记语辞汇释》所附“笔记语辞备考录”中若干词语作了探释。

蒋礼鸿《义府续貂》(1980)继清人黄扶孟《义府》之绪, 以“声近义通”为纲, 从语言角度探索词义词源, 考释了300多个词语。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考释了近100个词语。

程湘清主编的汉语史断代专书专题研究中的《两汉汉语研究》、《魏晋南北朝汉语研究》、《隋唐五代汉语研究》和《宋元明汉语研究》所收文章都是以专书为对象, 研究某一类词语或专题,

其中有些文章也对白话俗语词作有扎扎实实的研究。

此外尚有吴金华《〈三国志〉解诂》(1981),郭在贻《〈世说新语〉词语考释》(1983)、《训诂丛稿》,樊维纲《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词语释》(1980),祝鸿杰《唐代俗语词杂释》(1985)、《〈唐摭言〉语词札记》(1993),段观宋《唐宋词语考释》(1989);王继如《唐文语词札记》(1990),罗维明《唐代墓志语词考释》(1995),龙潜庵《宋元语词集释题记》(1981),王镔《唐律释词》(1991),胡竹安《宋元时“事”的特指义》(1990),袁宾《早期白话词义札记》(1983)、《俗语词零札》(1983—1987),蒋冀骋《近代汉语词义杂考》(1989)、《近代汉语词汇研究》(1991),袁庆述《近代汉语语辞考释》(1990),周志锋《近代汉语词语杂释》(1993),徐时仪《近代汉语词语札记》(1996),李申《近代汉语释词丛稿》(1995)和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及其在中古汉语词汇史研究上的价值》(1999)等。《中国语文》等刊物上还将一些有关白话俗语词考释的文章汇编成《语词札记》或《词义札记》,就一词而深入考探,既有深度,又要言不繁。

古白话中那些“其性质泰半通俗,非雅诂旧义所能赅,亦非八家派古文所习见”的词语虽然“自来解释,未有专书”,但却还有许多留存在方言口语中。这一时期有关方言词语的考释论文主要有王贞珉《明代方言俗语汇编叙录》(1980),胡竹安《山西稷山话所见宋元明白话词语选释》(1984),李行健和折敷濂兴《现代汉语方言词语的研究与近代汉语词语的考释》(1987),鲁国尧《〈南村辍耕录〉与元代吴方言》(1988)、《明代官话及其基础方言问题》,杨福锦《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所纪录的明代官话》,张卫东《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1998),胡明扬撰有《三百五十年前苏州一带吴语一斑——〈山歌〉和〈挂枝儿〉所见的吴语》(1981),董遵章《元明清白话著作山东方言例释》(1980),刘凯鸣《方言俗语与方言俗语词考本字》(1987)等。

王镔《元明市语疏证》(1992)、《宋元明市语续证》(1995)和

《宋元明市语略论》(1995)则考证了宋元明出现的一些市语,《宋元明市语汇释》(1997)一书搜集整理了有关市语的材料,考释其特定含义,探源溯流,用力甚勤。

这一时期白话俗语词的研究除了训释文献中“字面生涩而义晦”和“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词语外,也注意到一些常用词语的解释。构成某种语言词汇系统的主要部分毕竟还是常用词。常用词是与作为训诂学研究对象的疑难词语相对而言的词语,这些词语既不同于一般以词频统计为依据确定的常用词,也不同于词汇学中的基本词汇的概念,而是代表词汇的核心,这些词的发展变化往往可以决定词汇发展的面貌。

首先明确提倡并进行常用词研究的当推黎锦熙和王力。黎锦熙在旧版《辞海》序言中指出:“五代北宋之词,金元之北曲,明清之白话小说,均系运用当时当地之活语言而创制之新文学作品。只因向来视为文人余事,音释阙如,语词句法,今多不解”。认为“‘奇文共欣赏’却是中国大辞典底特别的任务,这个‘奇’实在就是‘常’,因为‘常’必俗。常俗用字,每为旧时字书所不屑道”。王力在《汉语史稿》第四章“词汇的发展”中勾勒了若干组常用词变迁更替的轮廓,又在他主编的《古代汉语》中专门训释了1100多个常用词。他在《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一文中指出:“无论怎样‘俗’的一个字,只要它在社会上占了势力,也值得我们追求它的历史。例如‘松紧’的‘松’字和‘大腿’的‘腿’字《说文》里没有,因此,一般以《说文》为根据的训诂学著作也就不肯收它(《说文通训定声》)。我们现在要追究,像这一类在现代汉语里占重要地位的字,它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至于‘脖子’的‘脖’,‘膀子’的‘膀’,比‘松’字的时代恐怕更晚,但是我们也应该追究它的来源。总之,我们对于每一个词义,都应该研究它在何时产生,何时死亡。”蒋绍愚在近年出版的《蒋绍愚自选集》中也多次论及这一问题,如《近代汉语词汇研究》中有“常

用词演变的研究”和“各阶段词汇系统的描写”专节的论述，又如《关于汉语词汇系统及其发展变化的几点想法》一文中对《祖堂集》里“木/树”“道/路”“言/语/说”等几组同义词的考察（1989）等等，并运用了判别新词与旧词的两种基本方法来统计使用频率和考察词的组合关系。张永言也曾通过考察个别词语的消长与更替（如：言/说，他人/傍人，有疾/得病）来探讨作品语言的时代特征，撰有《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1991）。蒋绍愚曾就此文提出设想，“可以根据一些常用词语的更替来考察词汇发展的阶段”。^⑤

张永言和汪维辉《关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一点思考》（1995）一文讨论了8组常用词在中古时期变迁递嬗的大概情况，通过具体实例的分析，大力提倡词汇史研究领域中长期被忽视的常用词演变的研究。

汪维辉《东汉魏晋南北朝常用词演变研究》（1997）选取了38组常用同义词，对它们的交替过程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描写分析，进而考察了中古时期常用词交替性演变的情况，资料丰富，考察细致。

李宗江《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1999）一书分“专题讨论”和“论文”两部分，探讨了常用词研究对象的界定、演变的原因、研究的方法和意义等。这是迄今为止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地论述汉语常用词演变问题的最新成果。

以上这些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深入发展，一些专书词典和断代词典也相继问世，从而为白话词汇发展史的研究和汉语各阶段词汇系统的研究创造了条件，并为编纂大型汉语词典奠定了按历史原则反映汉语词语演变过程的坚实基础。徐时仪《古代白话词汇研究与汉语词典的编纂》（1997）一文论述了古代白话词汇研究的状况，就加强古代白话词汇的研究和运用古代白话词汇研究的成果编纂汉语词典作了探讨。《汉语两个书面系统与

汉语词典的编纂》(1997)一文指出白话词的研究既从共时角度为汉语词典收录先秦以后历代产生的当时当地活语言中的白话词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从历时的角度为汉语词典揭示文言系统与白话系统中基本常用词的演变脉络提供了佐证。汉语词典的编纂，尤其是较为大型的汉语词典，是汉语词汇史研究成果的直接体现，必须尽可能从历时和共时纵横交叉的立体角度来反映词语的源流发展变化，兼及古代汉语的两个书面语言系统，体现出汉语词汇从古到今的演变脉络。因此白话词的考释和研究显然成为编纂大型汉语词典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型汉语词典的编纂应该着重揭示出汉语词语在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白话书面语言系统中的演变脉络，不仅注重历代常俗白话词的收录和考释，而且注重汉语常用词演变的探讨。

这一时期重新修订出版了《辞海》和《辞源》，《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这两部按历史原则编纂出版的大词典也相继问世，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汉语词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大致上反映了白话俗语词的面貌。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白话俗语词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于今后重版时修订补充。李申曾先后写成《〈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条目商补》(1995)、《〈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条目订补》(1997)和《〈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条目指瑕》(1998)就《汉语大词典》所收近代汉语条目在释义、引证等方面作了商讨。此外，周志锋《大字典论稿》(1998)，马国强《〈汉语大词典〉1—4卷释义商兑》(1991)，汪维辉《〈汉语大词典〉一、二、三卷读后》(1991)，董志翘《〈汉语大词典〉阅读散记》(1998)等文亦就《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的一些疏失之处作有补正。

这一时期相继出版的专书或断代词典主要有张永言主编《世说新语辞典》(1992)，张万起《世说新语词典》(1993)，张滌华主编

《全唐诗大词典》(1992),蓝立冀《关汉卿戏曲词典》(1993),胡竹安《水浒词典》(1989),李法白和刘镜芙的《水浒语词词典》(1989),王利器《金瓶梅词典》(1988),白维国《金瓶梅词典》(1991),周汝昌主编《红楼梦词典》(1987),周定一、钟兆华、白维国编的《红楼梦语言词典》(1996),吴士勋和王东明主编《宋元明清百部小说语词大辞典》(1992),王贵元和叶桂刚主编《诗词曲小说语辞大典》(1993),卢润祥《唐宋诗词常用词词典》(1991),温广义《唐宋词常用词辞典》(1985),沈伯峻等编著的《三国演义辞典》(1989),曾上炎著《西游记词典》(1994),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蒋礼鸿等《敦煌文献语言词典》,刘坚和江蓝生担任总主编的《唐五代语言词典》、《宋语言词典》和《元语言词典》,以及高文达和许少峰分别主编的两部《近代汉语词典》等。

综观这一时期白话俗语词的研究,较之前几个时期而言确有了长足的进展,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研究者们搜集材料比较广泛,从魏晋南北朝诗歌、小说,直到唐五代变文、唐宋诗词、宋元话本、金元明戏曲、明清白话小说,以至汉译佛经、儒释语录、史传、笔记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研究方法上,除了沿用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的排比归纳法外,在审辨字形、循音求义、引证方言和探求语源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在借助口语词考证文献的写作时代和所用方言方面,也有了有益的尝试。此外,敦煌写卷中俗文学作品的校勘、训释工作进展较快,本来错讹频出、窒碍难通的作品可以读懂的程度已大为提高。白话俗语词的研究为古籍的整理、辞书的修订和增补提供了依据,也为研究汉语的词义系统和词汇史提供了新的丰富的材料。

不过由于白话俗语词的时间跨度较长,材料异常丰富,加之原有研究基础薄弱,所以余留的空白点还有不少。鲁国尧曾指出:“现在对汉语史的研究确实较以前深入多了,各个时期皆有学人在奋力攻关,但是有些论著,冠以‘近代’或‘魏晋南北朝’,所引

材料上下数百年，地域遍全国，而书中却没有或缺少言及时空的差异，则有压时线成时点，聚平面为一点之嫌，仍然有欠于精深。”^⑦就白话俗语词研究而言，断代性研究、单元性研究有所深入，但历史性研究、全面性研究则尚欠深入。具体问题的研究与宏观的体系建设本是互有影响互为因果的。没有一词一义一个问题的研究，词汇体系无法建立；没有词汇体系和理论的指导，一词一义一个问题的研究就会显得零乱片面，难以有重大的进展。因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全面整理归纳现有成果，进行专书和断代研究，写出概论性专著和学术史，形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和研究网络，建立起系统的汉语历史词汇学，从而不仅使白话俗语词的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而且也将对普通语言学的研究作出贡献。^⑧

注：

①②郭在贻：《训诂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版144～145页。

③入矢义高：《评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一号，1954年。

④入矢义高：《评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十一号，1959年。

⑤如梅因：《水浒名词解释》，1975；傅才：《水浒词语解释》，1975；上海人民出版社辞海编辑室《水浒部分词语简释》，1975；《红楼梦曲和金陵十二钗图册题咏评注》，1974。

⑥蒋绍愚先生1991年9月13日致张永言先生的信。

⑦鲁国尧：《“布文”辨识及其他》，《中国语文通讯》1994年第29期。

⑧拙文例举论著如有挂一漏万之处，敬请作者和读者补正。限于篇幅，文中在作者后省略了先生之称，论著出处仅标出年代，读者可参阅有关索引。

作者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